

探究“月球语言”的“庐山真面目” ——法国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教授访谈录 (上)

龚君姬*

吴剑

浙江大学, 中国

摘要

本篇为法国白乐桑教授访谈的上半部分。在这部分访谈中, 白乐桑教授谈论了他本人学习汉语的经历与主要动机、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独特性、翻译当中存在的“不可译”问题、汉语教学“二元论”的提出、编写《汉语语言文字启蒙》这套教材的初衷及主要的教学理念。白乐桑教授的主要观点包括: (1) 对于西方学习者而言, 中文是“月球语言”, 其“远距”性是最大的内在学习动机; (2) “中文难学”这一说法忽略了学习者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动机; (3) 学习中文和哲学的共性在于“元好奇心”; (4) 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最需要关注其独特性, 做到“字词兼顾”, 中高级更多走向词本位; (5)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应该被视为第二文字语言教学; (6) 语言学的宗旨是语言描述和分析, 外语教育的宗旨是转化; (7) 要以学习者为中心, 考虑学习汉字跟记忆力之间的关系; (8) 中西方文明结合起来才是整体。

关键词

汉语学习动机, 元好奇心, 二元论, 词本位, 汉语第二文字语言教学

访谈者简介

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 (Joël Bellassen, 1950-) 为首任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ALCO) 教授、全欧首位汉语教学法博士生导师、法国汉语教师协会创始人及首任会长、欧洲汉语教师协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负责全法汉语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制定与修改、汉语师资力量考核和聘用。先后主编《汉语语法使用说明》、《汉字的表意王国》、《说字解词词典》等专著四十余部, 发表学术文章一百一十余篇。主编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1989 年出版以后被法国高校、中学、民间团体和官方等部门广泛使用, 多次再版。

1973 年, 您成为法国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 起初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汉语, 第二年转入北京大学学习。请问您当时为什么想要来中国留学呢? 又为何从北京语言学院转向北大呢? 您在北大期间, 徐通锵先生给您上过课吗?

* 通讯作者。联系电邮: taizhoubaby@gmail.com

首先我纠正一下，我不是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而是中法恢复文化交流后的第一批。中法建交比较早，法国作为比较重要的西方国家最早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真正的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是1964年的。当时法国派遣了20名留学生，都是中文系毕业的。1965年又派了一批，差不多21名留学生吧，也都是中文系毕业的。文革爆发后这种交流就中断了。等到1973年文革后期，又恢复了文化交流。而我正是这一批，也就是1973年底公派的留学生。第二，我也冒昧地纠正一下，我当时根本没有打算去中国留学，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打算。我最近几年经常说，我当时学汉语相当于学了“月球语言”，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我学习汉语的内在动机中的最强烈的一个，就是想学远距语言与远距文字。其实，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远距国家。可是当时比现在更远距，当时的中国因为文革影响，没有任何交流，也没有旅游团等，我当时以为中国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几十年。因此，在我真的开始主修汉语作为专业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去中国的打算。当然，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放弃汉语学习，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年，也就是说，读到了四年级并且拿到了一个文凭。其实我学了三年汉语的时候就拿到了一个学士学位，然后四年级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更高一级的文凭。拿到了文凭准备放弃继续汉语学习的时候，离放弃差一个月的时候，就得知中法恢复了文化交流，可以互派留学生了。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是留学生，去哪儿注册、报名、申请等一概不知。当时的中文系秘书处告诉我们，如果对去中国留学感兴趣，那可以去外交部。结果我就赶紧跑到外交部拿到了一份申请表，之后就是等待。1973年5月底的时候，在等了几个星期以后，我以为没戏了。因为当时我算申请的学生中比较年轻的，而且申请者不只是巴黎的学生，还有外地几所中文系的。所以我以为，可能是先给年纪大的机会。结果，消息出来，我被录取了。所以到那一刻，大概是1973年的6月份，我才知道我要去中国留学。

关于为何从北京语言学院转到北大，我也冒昧地纠正一下。我们当时哪有选择啊，我们都不知道会去哪所学校。因为中国恢复文化交流的第一年，留学生都集中在北京语言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语。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可以继续学一年。到了中国以后，大概几个月之后，才知道谁愿意继续学，再学一年也是可以的。我们30个法国留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二决定再进修一年。所以我当时给我父母写信告诉他们，年末我就不回法国了，再继续学一年。然后关于“为什么选择北大”这个问题，其实我哪能选择北大，我们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也就是说，第二年是根据所报的专业，大概有中文、历史、文学、哲学这几门专业，要么是被分配到复旦大学，要么是被分配到北大。当时我说要学哲学以后，他们以为没听明白，因为几乎没有留学生会去申请哲学系。欧洲留学生当中就我一个人，还有几位加拿大的和一位非洲的，所以我们是留学生人数最少的一个专业。因为我报名哲学系，所以第二年是上北大，这是分配的，我们是没有权利选择学校的。

在北大期间，我没有上过徐通锵先生的课。当时中国很长时间没有接受留学生，我们也算是第一批留学生，所以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不是像现在一样可以去上课程中的一些科目。我们的课主要是以辅导的形式进行，另加个别讲座。当时我们学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的哲学等比较受局限的科目。可是，对我个人来讲，上二年级的时候，虽然因为我个人的兴趣我报的是哲学，但是我当时已经非常明确今后我的发展将走向汉语专业。我报的是哲学系，目的却是为了提高汉语，提高汉语的听、说、读、写。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无论是上关于黑格尔的课还是其他的课，都是用中文记笔记，包括一些比较枯燥的术语。因此，二年级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中文水平总体比较满意。

您当时一开始跟着他们学哲学课，会觉得有难度吗？

我很多次不管是跟普通中国人见面，还是跟中国老师或学者见面，他们常常会说：“中文难学”。说实话，我对这样的说法有一些反感，因为我觉得他们怎么能替我发表看法呢，学习

者不是他们,是我们。而我尽可能客观地、真诚地回答你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特别地难学。如果你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问我,你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难学的科目,我肯定会说,那当然了,比如数学,数学我感觉很难,而且是很恐怖的,难度特别高的那种。然后,我也会提化学,我觉得太难了。但是,几年之后在大学学哲学,学中文,因为兴趣,你问好学吗,我觉得也不是好学,你说难学,我觉得也不是难学,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我真的是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第一,说的最多的就是中国人;第二,我真的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思维,中国心理上的一个倾向,把一切问题从特别主观的角度、从体验感受的角度去分析,甚至有的中国老师在法国讲课的时候,他们会告诉学生中文很难学。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英语老师或者数学老师会说数学很难学。所以你如果问我从事教育那么多年后的感想,我会说,哪有好学的专业,所有的专业都有它的难度。比如说,我们仨同时学一个新的专业,可能上了一个月以后,君姬会说:“哇,太好学啦!”吴老师会说:“其实有一点难啊!”我会说:“太难学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比较流行的“中文难学”这种说法忽略了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动机。其中动机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跟所谓的好学难学是密切相关的。

白老师,接着您刚才提到的动机问题,我想问您,当年和您一起留学中国的法国同学中,大多数都成为了名声显赫的汉学家,您觉得您和这些同学们决定致力于汉语语言文化研究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我从事汉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差不多有12年了,所以如果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不敢替别人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学习动机的个案,必须得去采访这个人,可能需要两个小时,然后还得搜集各种信息和各种材料。可是,因为我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有10多年了,我知道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比如说,学习汉语我觉得跟追求挑战的那种性格有关,这无论是以前我的一些同学,还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研究过的一些法国汉学家,我仔细研究过他们的生平,发现包括跟汉语学习无关的,他们确实都有追求挑战的性格。另外,跟个人的心理特征也有关系。比如我那29个同学,他们的个人特征,我现在回顾一下,我敢断定,绝大部分是属于一类人,那就是属于追求“远距”这一类型的。因为经过研究,包括通过读学术性文献,研究心理学,我发现大体上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追求“近距离”的。这类人无论去哪里度假,或者周末去做什么,一般来讲,他们都是追求比较固定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周末去哪里吃饭呢?他们可能倾向于说:“好,还是去上次或者每次去的那个餐厅。”第二类人,追求的是“远距”。这里的“远距”当然是多义的,比如说去哪里度假,在一定程度上去得越远越好。而且,每次尽可能要换一个地方。而第一类人则倾向于去原来去过的地方,因为“近距”是追求熟悉的。第二类人追求探索与发现,即法文中的“*découverte*”。也就是说,尽可能去没去过的省份或国家等。那如果是学习呢,比如说学习外语,以我为例,我这几年也经常尽可能客观地对我自己进行分析,君姬知道这个真实的故事。我在巴黎大学快上完哲学系一年级的時候,校方发出通知,告诉我们第二年,学校将作为一个试点,学生要主修两个专业。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我就自然地走向外语这条路,这一选择也反映了我的个人特征,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听觉型的。第二,可能是我比较爱交际,比较喜欢传播和传递。可是,最有意思的是,我当时想选择外语作为第二个专业,我选择的是西班牙语。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那简单地说,是因为跟我关系相近。第一是我在中学学过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第二因为我是法国南方人,南方人比较倾向于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类的。第三我的家族血统,几代人以前是有西班牙语血统的。我的奶奶,小时候每次见我,一说起带有感情的话,马上转为西班牙语,所以我小时候听了一丁点的西班牙语。我初步的、自然的选择是去注册西班牙语系,但上了两三个星期的课后放弃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想改成中文系。很有意思的是,我改学中文的原因,跟我最初选择西班牙语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我选择西班牙语是因为有亲缘关系,是相近的,我放弃西班

牙语，也是因为“相近”。而中文吸引我，正是因为法文所说的“*mystérieux*”，就是神秘的意思。你们要理解的是，法文的“*mystérieux*”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褒义的，不是中性词汇。为什么呢？因为“*mystérieux*”其实含着一个值得发现、值得探索的这个含义，所以是比较褒义的。我觉得“神秘”这个词在中文要么是中立的，要么有时候有一点点贬义的。所以显然我追求的是“远距”。幸好我的学校有中文系，那哪有比中文系更远距的呢？其实，我们学校也有俄语系，我从来没有想去选择俄语，因为毕竟俄语也是有字母的，虽然不是拉丁字母，可是毕竟是字母。可是“中文”，我们学校中文系秘书处门上这两个字就象征着“远距”，文化上、文字上、语言上的远距离。也就是说，正好因为这两个字，你不知道是从右到左还是从左到右读，是什么意思，如何发音。正好因为这个，我就想去看看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文化等。

您在大学（巴黎第八大学）本科阶段主修的专业是哲学和汉语，您能谈谈您当时主要上了哪些课程吗？

我上哲学系二年级的同时，就开始上中文系的一年级。总课时不少，可是能承受。我当时所在的哲学系不是一般的哲学系，而算是最先进的哲学系，里面有一些哲学界的明星，因为我们学校是1968年5月风暴之后成立的，是教育部决定在巴黎建立的一所新型大学。教育部的意图是建立一所各方面都有创新的大学，所以我们这所大学里有全球第一次开设的精神分析学习课程，也设立了一个中文系。其实本来表面上应该说是多余的，因为巴黎已经有两个中文系了，可是最初的动因就是要成立一所比较先进的、比较有创新的学校，所以新设了一个中文系。我所在的哲学系，老师中就包括著名的福珂（Michel Foucault）先生。中国有很多他的中文版著作。福珂当过我的老师，我说当过我的老师，不是按中国人所说的意思。我后来发现，一个中国学生如果去听了一位老师的讲座，然后就可以说我是某某老师的学生。而福珂当过我的老师，是说我注册了他的几门课，参加小考，拿到了这几门课的成绩等等。我同时也上中文系，课程应该说是比较规范的，也就是说，以语言为主，所说的语言绝大部分是现代汉语，可是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所以也有文言文学习。具体来说，课程上现代汉语的听说读写都有，加上法文所说的“*cours de civilisation*”，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文明课”，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文化课，具体是讲中国文明的，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包括历史、地理、古代思想等等，文明课是用法文讲的。我们的语言课包括法汉翻译、汉法翻译、精读、泛读、语法课等等。

当时的主要教材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不仅记得，而且是难忘的。我说难忘，你们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是歪曲了中文内在面目的那种教材。我说的是中国大陆的教材，当时别的中文系也用来自大陆的教材。可是，有一个系用的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 John De Francis，中文名字叫德范克的系列教材。请你们俩注意一下“德范克”这个名字。他的教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所谓的字本位教材，跟我的思路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我只是更加系统地发挥所谓的字本位路子，德范克非常重视汉字，他把字也作为一个最小语言教学单位，这也是我的基本观点，这正是到现在中国主流路子否认的一个本体的问题。另外，德范克先生在选字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特别注重字的频率。你们看他的所有的教材，没有一个不是高频字的，跟我一样，可是我当时不了解他的教材，就知道有个别中文系用的是德范克的教材。几十年以后，也就是说最近十几年，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发现中国学术界，中国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学者，很少有知道德范克的。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思考了很久，如果是所谓的小语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德范克他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教授，而且他的教材是英文的，而中国大陆的教授有去过夏威夷大学讲课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德范克？

白老师,德范克其实我最开始也不了解。您是第二个跟我说起德范克的学者。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才看到德范克这个名字的,因为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有一本刊物叫《华文教学与研究》。在2019年这一期中,中国的语言学家冯胜利写了《赵元任的单音节神话与徐通锵的字本位》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讲到了德范克关于汉语跟汉字的十大神话。

我知道,我读过。可我认为德范克最大的贡献毫无疑问是他的教材系列。

所以,德范克这个名字我听过,但是我是2019年的时候才知道的。

可是,冯老师是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我说的是国际中文教育,也就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界那么多的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问题,还是最值得提出的问题,“为什么?”。

白老师,您觉得您的哲学专业背景对后来的汉语教学与研究有什么影响吗?而且我们知道很多著名的汉学家都跟您一样,学汉语之前其实都有哲学背景,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我大概是11年前去采访刚刚过世的法国汉学泰斗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先生。正好当时我已经开始研究汉语的学习动机,所以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请他告诉我最早是怎么去选择汉语的。他说他是从19岁开始的,汪老解释道:“我算是一个好学的年轻人,当时我已经有两个专业,一是法律,二是哲学。”然后他又补充道:“星期五因为没事干,所以我就去上中文系。这样就三个专业了。”他说到这里,我马上打断他,我说:“汪先生,我凭感觉意识到我们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些从事汉学或者汉语教育的,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同时主修哲学和汉语的人的比例非常高,超一般的比例,这是比较超常的。您是怎么想的呢?您觉得不可能是偶然的吧?”汪先生反应很快,不等我说完,他就指出肯定不是偶然性的,然后他当场说出了一个法文词,尽管这个词法文词典到现在还没收录,是他自己造的,可是一听就能明白。他说中文和哲学有共性,一个西方学习者学习中文和学习哲学是有共同之点的,这个共同之点就是“*métacuriosité*”。如果直译的话可以翻译成“元好奇心”。虽然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可是我当场就明白了汪老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哲学是所有科目之上的一个科目,是跨专业的专业,因为它是探究任何一个专业最基本的问题。另外呢,哲学的地位是所有专业中最特别的,应该是最有概括程度的,因为它专注最本体的问题。那中文呢,中文作为专业哪有那么大的独特性。我的理解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尤其是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欧洲是多元的,多元语言、多元文字的大洲,可是毕竟这些文字,比如希腊文字、俄罗斯文字,如果加上中东就是阿拉伯文字、希伯来文字,这些当然是多元文字,可是毕竟都是字母,不同的字母。而中文呢,文字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所以,我理解汪老的意思,可能是从一个欧洲学习者的角度去学习汉语,因为它的文字,当然也有它的文化,使我们学习者能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去观察、分析、探究所有的语言文字组成的一个整体,我们才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个独特的视角,如果没接触过中文,可能很难思考,比如说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而我们都知语言 and 文字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在哲学上也是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加上中国文化对于一个欧洲学习者来讲,应该说是他者文化,也是远距文化,而且应该说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是历史最悠久的,可是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古代思想是走向另一条路的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去学习汉语,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会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特殊的视角。如果我的理解对了,我太赞同汪老他提到的中文可能是从一个远距学习者的角度,而且从一个母语是有字母的文字的角度的,比如像我,法语是我的母语,是拉丁字母,如果去掌握一个表意文字——汉字,那我肯定会重新思考文字本身的问题以及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等等。

白老师,汪德迈先生对中国的甲骨文有深入的研究,我觉得他探究中国文字的源头,也跟他的哲学专业背景有紧密联系,您觉得呢?

君姬，你说得很对！而且应该说汪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他是第一位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第一位，如果我没错的话。西方汉学那么多的学者没有像汪先生研究甲骨文这么透彻的，而且他的研究不只是能读懂甲骨文，而且是从哲学的角度，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发表一些重大的观点。他的观点在语言学界应该说是反潮流的，属于非正统派。而且这个问题，我跟汪老谈过多次，他的观点从最开始就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呢？虽然他是从语言学、哲学、甲骨文等角度来谈的，可是，如果仔细思考，其实和我多次提出的现代汉语教学方面的本体问题是有交汇之点的。汪老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他说尤其是早期的中国文字是“*langue graphique*”。他第一次说这个观点，应该是在1980年，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我当时正好是走向对外汉语字本位的路子。可是一说是“*langue graphique*”，尽管他提出的背景和我的不一样，可是我很能接受。他提到的“*langue graphique*”，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属于非正统观点，是因为对于正统的语言学来讲，文字不可能是一门语言，而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而已，是为语言服务的。而汪老从最开始就说，中国文字有它的独特性，是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正好跟我提到的二元论是有关系的。因为从我们学习者的角度来说，学会生词“电脑”和学会“电”和“脑”这两个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两门不同的知识，既有不同规律的知识，也有不同内涵的知识。

白老师，“*langue graphique*”中的“*graphique*”是翻译成图画吗？

翻译成图画可能不太好。其实我问过汪老，我说“*langue graphique*”如果翻译成中文，该如何翻。他坚持说只能翻译成“文”。我本来想知道他会不会说“书写语言”或者其他什么的。反正他说是“*langue graphique*”，所以重点在于*langue*（语言）。把一个文字说是*langue*（语言），这当然是非正统观点，可是我从最开始就很能接受。反过来，现在的主流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不能接受这个观点，而且把汉字当成只是记录语言的一个工具而已，就类似于abcd。如果你仔细观察分析中国大陆历代的对外汉语教材，其实你会同意我刚才说的，就是大体上汉字是跟abcd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地位。难怪这些教材没有给单字释义，如果你拿德范克的教材，你当然会发现每一课书不仅有生字表，也有生词表。而且你会发现每课书列出十个生字，不是十一个，不是九个，是十个。这说明德范克把字也当成是最小的语言教学单位，所以要考虑到它出现的情况，每课书十个汉字，是哪些汉字？当然就是高频字，然后要让那些高频字重复出现，这是汉字的复现率的问题。

后来，陆俭明先生在刚任世汉会会长时作了第一次重要发言。我听了他的发言，尽管我当时跟陆先生不是很熟，但我就知道他是主张字本位的。尽管他没有说，可是我完全可以从他这个发言当中拿出几行来作为字本位的定义，他说出了我认为是二元论的基本内涵，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后来跟陆先生越来越熟，我跟他说了这一点，他也很赞同，所以他是国际中文教育界的少数派，在中国属于少数派。可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种种背景，中国人不会将此归为少数派，只说是不同的观点。可是，你只要看陆先生的文章，你很快就会发现这和中国20世纪中叶开始成型的对外汉语界的观点完全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地说，在中国主流是词本位。在陆先生之前，吕必松先生晚年的时候也明确地走向二元论。

白老师，所有认识您的人都惊讶于您标准的带京腔的普通话，你能告诉我们您是如何做到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吗？有什么秘方可以分享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能也要来纠正一下，如果说得严肃一点，我觉得中国思维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就是比较实用主义。你刚才问有没有特殊的秘方，也就是说，你认为这有一个特殊的办法，特殊的手段，特殊的一个秘方，使我能有这样一个比较标准的发音。你别介意，这不是因为中国文化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忽略了个体呢？因为如果你承认个体的存在，那就是说，吴剑是吴剑，君姬是君姬，张三是张三，李四不是张三，王五不是李四，也就是说，李四的个

人的特征,李四的特长,可能跟王五不一样,我估计肯定不一样。那也就是说,你本来应该问我,白老师你小时候的环境有哪些使得你养成了一些特长,比如说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当然小时候的环境也会产生一些不足。也就是说,我跟任何人一样,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特征就养成了一些特长,同时养成了一些不足。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因为爱好唱歌儿,爱好做业余的乐团指挥,经常带我去听。更重要的是,因为虽然这些不是我父亲的工作,可是唱歌音乐这些对他来说是一种激情,一种特别强烈的爱好和特长。他唱歌唱得确实非常好,本来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歌手的,以前很多次有人给他录音什么的。我简单地说,我从一生下来,因为父亲的爱好,我个人的音乐环境就比一般人丰富很多,我每天每时每刻,只要父亲在,我就听了很多的歌曲。所以我知道我有一种比较好的类似于音乐方面的记忆。可是我对人脸的记忆不好,也就是说,我的视觉记忆不好,你们看,也养成了不足。所以我是倾向听觉型的,可是听觉型当中也有不同的。我那个旋律性的记忆,不只是听觉记忆,是跟音乐有关的。我在这方面特别敏感,比如说,我听两次一首交响乐,我就能记住。然后,我开始主修中文的时候,我的声调和发音应该说比较好,可是我字开始写得比较难看。而我的一些同学,从最开始字写得还是比较整齐的、比较好看的,可是发音声调比较差。这些不是秘方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要跟实用主义的分析保持距离。

看来,对音乐的爱好是对语言学习有帮助的,像赵元任、刘半农他们都是音乐特长的。

对。是说对语言学习有帮助的,还是说对音乐的爱好和外语学习能力都有同源关系呢?

白老师,我记得您曾经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学校(Ecole alsacienne)做过一个实验,专门根据学习者的类型进行不同的教学尝试。这些学生中有些是视觉型的,另一些则是听觉型的,就像您一样。您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吗?

我可能跟别的汉语教师不同,一方面我非常投入汉语教育,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保持距离用来观察分析,这应该跟我的哲学爱好有同源关系。80年代我已经是正规的汉语教师,开始看脑科学家们写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些讨论右脑与左脑之间的关系、左右脑和汉字之间的关系、汉语母语阅读障碍、失语症等等。比如说,有些人因为患了脑梗就不会说话了。我对汉字与失语症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想到了做这个实验。我设想,如果让法国小朋友,尽可能是幼儿园或者一些小学小班的孩子们接触我们欧洲语言根本没有的现象,也就是说,让他们接受中文的独特性,第一汉字,第二声调,那说不定会起到发展智力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就开始设计一个教学实验,以中文启蒙教育作为发展智力的实验,这也跟左脑右脑是有关系的。设计出了以后,1987年开始按照每周幼儿园中班一个小时、小学一年级一个班一个小时,小学三年级一个班一个小时进行教学。我是义务教师,这个实验当然是经学校校长许可同意的,而且也获得了教育部的认可,并授予“教学实验地”实施教学创新。这样就开始进行了几年。我本来的目的是让一个心理学家去做客观评估,对比参与实验的小朋友跟没有接受实验的小朋友,测量一下我这个实验带来的益处。我确实找到了一位心理学教授,经过研究他初步认可了我的这个实验。可是问题在于,正好那一年我被任命为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那是1991年,所以我就离开了中学,到了国家公务员的岗位,到了大学工作。可是,这个教学实验我一直印象深刻,现在有些公司、协会或者学校还会找我讨论类似的实验。两周以前就有一位幼儿园的校长约我,也是谈论这些问题的,我还是特别感兴趣。

赵元任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讲《从信号学的立场看中国语文》中提到:“各国语言里不同的方面各有难有易;平均说起来么,我觉得中国的语言在世界上,对于没有学过任何语言的小朋友,

可以算是中等，也不特别难，也不特别容易。至于说中国文字方面，在世界上比起来就相当难了。”您觉得从语言类型学的观点看，汉语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这个问题是不是又体现了中国人心理方面的或者说中国思维方面的一个特征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仨都是从事数学的，你们不会向我提出数学难学的问题。我问过一些数学专家，他们数学教学界在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有没有议论过数学难学的问题。他们开始没听明白我的问题，后来说没有，从来不讨论这些问题。那就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数学好学，这当然不是；要么就是“难学”的讨论可能是中国的一个惯性的行为。当然，我不是说中文好学，我从来没说过中文好学，但是我觉得中文有它的独特之处。如果你们问我，字母文字和几千个汉字哪个掌握得更快，毫无疑问，是字母，这一点不必争论。

可是，关于汉语难学，法国学生不如你们说得那么多。所以我们法国汉语教师早就有共识，如果要介绍汉语，不要说汉语难学，也不要说汉语好学。我们会说汉语是具有独特性的，是独特的语言。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提出来和讨论的。其实说实话，如果让我选择学习俄语还是汉语，我从一开始就肯定不会犹豫，我肯定会选择汉语。我小时候并没有读过中国故事什么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应该说是没有专门接触过中国文化的，但是为什么走向汉语呢？其中一个理由，可能我心理上会觉得俄语更难学。因为我听说过，俄语尤其是语法，时态变化好像很复杂，我当然不会说文字很复杂，虽然确实比拉丁字母难学。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让我概括一下中文的独特性，毫无疑问放在首位的是文字，也就是汉字。第二是声调，因为欧洲语言没有带声调，所以对我们是非常陌生的一个现象。第三是没有形态变化，或者说形态变化很少，是非常薄弱的，语法其实主要是句法。第四是话题凸显语言，不是主语凸显语言。第五是意合语言，不是形合语言。法语是最典型的形合语言，也就是说特别注重这个逻辑连接，“因为……所以……”，“即使……也……”等等，中文注重并列，所以是意合语言。

白老师，您上次讲座的时候也提到了，您认为词汇反映出了有无的现象，不同语言的词汇反映了对世界不同的划分方式，翻译会导致思维方式之间的碰撞，那么您用法语翻译汉字的意思是如何实现的呢？您曾经翻译过鲁迅的小说，您在翻译过程中有遇到过“不可译”的困难吗？

关于翻译的困难，其实也不一定去找中文这个远距语言来说明。日文，虽然我没学过，可是因为最近读过一些书，我感觉日语里边难翻的词汇可能更多。比如说有的是描述一些特殊的印象，人的印象、人的感受一类的一些概念，是法文或西文中没有的，只能用一个比较长的解释和说明。所以，各种语言在这方面是有冲突碰撞的，所以我上次提到了连最日常的“老王”或者“吴老师”都是最难翻译的。也就是说，真正地恢复原来的味道和内涵，是最难做到的。翻一些专业的医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语言学的什么，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老王”、“吴老师”没法翻，当然还有好多这样的词汇。这同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学外语的重要理由和重要动力。非常有意思！其实法文和英文也有这样的冲突，因为是概念上的冲突，过去的文化背景的冲突，或者是自然环境的冲突造成的。最早很多法国学习者去中国的时候，在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窗外的水稻，比如中国南方的水稻，学生会说“看，米饭！”。为什么？因为中文的“米饭”和“水稻”在法文里边只有一个词，是“riz”，英文中是“rice”。可是中文就是要区分成三种不同的词（水稻、大米、米饭）。这样的例子太多，可是最有意思，有时候是抽象一些的词汇。

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过：“整个西方的思想资源是来自希腊的”。伽达默尔的感觉是这个资源已经被用尽，如果西方思想还要保持其生命力，需要寻求其他思想资源的源头，他猜测这个源头有可能是在东方或在中国。白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到位,我觉得所谓的“中西”,其实是“中欧”,而且所谓的“欧”主要是指以古希腊、古罗马为基础及楷模产生的。这两种文明的特征,确实我觉得合起来才是整体。我觉得这必须得回到哲学。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西方哲学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根源是古希腊哲学。可是它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古希腊文的语法。也就是说,古希腊语的最基本的语法特征产生了西方哲学,也塑造了西方哲学。古希腊语跟后来的拉丁语、法语和绝大多数的欧洲语言,最核心的词是什么?是“to be”。古希腊的那个词,就成为了整个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就是核心的核心。问题在于,中文过去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甚至现在的“是”这个字也没有跟“to be”有等同的价值。差远了。所以,以这样断然不同的出发点,我们就能想象到为什么后来中国一直没有产生一个逻辑学。我有时候在培训中文老师的时候,经常是有互动的,我也会留一些作业。我常常发现,包括跟一些中国人交流进行对话,我发现他们的表达有时候是违背逻辑学的一些基本规律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是我在培训中文教师的时候,是以文化教学为主题的一个培训。我培训了上千位汉语母语老师,不只是在法国各地,还包括别的欧洲国家,也包括在中国,所以我在这方面有一点发言权。我当时给他们留的作业是,他们要教不同的文化点,比如说中国菜。好,给他们15分钟的时间做好准备,看看他们怎么讲。我当然会提出指令,其中一个指令是:一定要做对比,要比较。比如说,你在讲中国饮食文化,当然要与法国的饮食文化做对比,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讲中国戏曲,比如说中国京剧,你当然要拿西方歌剧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这是指令。我有一次让他们准备以春节为主题的文化教学。我做的这个实验是面向上千位汉语母语教师的,所以比较有代表性,我告诉你们调查的结果。

他们在讲将春节作为一个文化点的时候,做比较的时候,90%以上的汉语母语老师都是跟圣诞节作比较。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可是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我说的逻辑是跟逻辑学有关的问题。欧洲的逻辑学是明显地区分本质和表现形式的。我觉得第一,我们需要先指出春节的本性是什么?最本质的是什么?要么说定义,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定义”在中文里边是外来词,中文是很晚才引进“定义”这个概念的,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回到“春节”,我认为春节先要说的是它的本性,它的基本定义,也就是说是“中国传统新年”、“中国农历第一天”。如果我给你几秒钟说春节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回答的是这个。可是上千位参加培训的汉语老师回答的是什么呢?他们回答的是,春节是家庭团聚。那我觉得家庭团聚不是本质,是表现形式。是因为农历第一天,所以会产生以下表现形式,比如说家庭团聚、给老人拜年、放鞭炮、北方吃饺子等等。可是这些都是表现形式,不是本质。所以我觉得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实验非常有意思,是逻辑上的问题。

白老师您说的,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过的汪德迈先生的书里面,他提到通过理性的原则,交流性语言就转化成概念性的语言,然后在西方思想当中就发展出来了逻辑学,中国思想当中就发展出了字法,我觉得这可能跟您说的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

对。包括我很多次跟中国同事交流关于所谓的字本位,这是我到现在都最感兴趣的,我真的是想进行一个调查,想真正地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坚持这么一个很矛盾的观点:一方面都承认中国是表意文字,可是另一方面北京的中文教材没有生字表,这也是逻辑学的问题。从逻辑学的角度是完全矛盾的,要么你承认是表意文字,在教材里边你必须得释义,不然的话,所谓的表意性不能体现出来,所以这又是一个逻辑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不完全是逻辑,也是文化方面的,包括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有的人确实真正地赞同我这个观点,甚至写过文章,可是要么说词本位,要么说二元论。这个观点是本体问题,是根本问题。所以从逻辑的角度来讲,A和B两种观点,如果你赞同A观点,因为B观点是完全对立,你就非得讲B观点,讲为什么不赞同对立的观点。可是我发现,在中国赞同A观点,可是不讲B观点,我知道这不只是逻辑问题,可是我觉得也是逻辑问题,因为逻辑学里根本的一条叫做“principle

de non-contradiction”(不矛盾原理),这是逻辑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有 A 和 B,是对立的观点,那要么是 A,要么是 B。可是在中国,因为可能别的原因,那就说 A 是对的,可是不说 B 是错的。

白老师,因为汉语的独特性,《欧洲框架》的很多标准其实并不适合汉语,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据我们了解,您和欧洲汉语教师协会的同事们目前正在参考欧洲框架,针对汉语的独特性进行适合这一独特性的标准制定,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目前的进展情况吗?

好!这个汉语标准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为什么呢?随着汉语教育的发展,汉语纳入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高考中,所以理论上我们必须得制定相关的汉语标准,而且尽可能适合《欧洲框架》。本来《框架》出来之后,每个语言应该由对方国家的专家开始动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就每个等级列出相关的描述。《欧洲框架》出来之后,2000年开始陆续地有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越来越多的语言,由自己国家的专家开始设立一些就每个言语活动每个等级的相关的描述,比如说对外法语,A1的口头表达,具体是包括哪些元素。可是中方没有加入,所以我们欧洲几个从事汉语教育的专家也就不得不参与。到了2011年,德国欧洲理事会那边的一位老专家,尽管他不是从事汉语教育的,但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告诉我们具体该怎样申请欧洲项目。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大概进行了差不多一年的筹备工作,终于在2011年拿到了据我所知应该是第一个跟汉语有关的欧洲项目,英文简称叫做EBCL(European Benchmarking Chinese Language),也就是说欧洲汉语标准项目。这个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方没有加入。中方当然有很多顶级的专家,比如说老汉语水平考试北语的那么多的专家,本来他们完全可以去做。可是因为中方没有加入,我们只好就欧洲4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一起动工。每个国家就几个专家,我们人马非常有限,所动的工程就是将欧洲框架的理念和欧洲框架本身的大概的定义等应用在我们的汉语上。有意思的是,我们本来申请的是两年的时间,而且获得这个项目是承诺两年之后就完成的。可是,团队人数非常有限。我不属于法国团队,我是专家委员会的,是里边唯一一位从事汉语的。我们的起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首先宣布汉语是有独特性的,汉语不可能跟别的语言混为一谈。比如说,最低等级的描述,不可能以简短来说明它的难易度的。不是因为简短,所以会很容易。我们这一点都很清楚,所以在开始动工之前,我们四个团队都一致认为,必须得先说明,除了所谓的听、说、读、写,也有汉字能力。我们不仅认为汉字是一个教学单位,而且认为是有它的相关能力的,这一点跟中国的比较传统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对中国主流来说,汉字就是一个记录语言而已,像字母一样的,西方语言没有什么字母能力。我们则完全不同。我当然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另外,法国团队的专家安雄教授是我最早的博士生,他是90年代末,我刚刚拿到了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文凭,我接收的第一位博士生。另外像德国的顾安达,最开始做的是汉字方面的,他的专业也就跟汉字有关,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字素能力”(graphemic competence),跟我的字本位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这又证明了不像中国学界那样,认为所谓的字本位就是白乐桑。其实我们这里很多专家基本上都一致,当然我可能发展得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包括教学方面等等。回到EBCL项目,因为人马太有限,我们两年之后没有完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是业余时间动的工程,可是我们完成的部分是最关键的等级,也就是A1和A2,因为A1和A2首先得解决汉语有没有独特性的问题,然后我们怎样具体实施,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一贯的观点是,最初阶段最需要关注汉语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越到中级和高级越走向词本位。可是最初阶段,绝对需要字词兼顾,而且要把字当成一个同等的单位。因为我们没有完成6个等级的描述,所以欧洲部门没有继续资助我们。之后我们向汉办马箭飞副主任汇报了我们的成果,而且表示希望今后跟中方继续动工并完成。就这么一个过程。

我再补充一点。法国还好一点,因为法国应该说是最早就让汉语的独特性纳入官方的教学大纲的。以字表的形式,后来改叫汉字门槛。最初是我本人,当时我是作为普通的老师跟兼职

总督学联系,跟他说唯一能解决法国国民教育高等毕业会考中文专业的笔试的手段,是公布一个高频字表。我跟他说了以后,虽然他不是我们这方面的专家,可是他立刻明白了并接受了。所以,1985年我起草了一个400字的字表。当然这是一个门槛,因为是以频率为标准的。当时这个字表就发到所有的老师那里。后来教育部也就将这个字表纳入了,这样就解决了法国国民教育高中毕业会考中文考试中笔试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字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法国的老师是享受教学自由的,也就是说他们有权选择教材。我的意思是,除非有一个统一的教材,否则法国是不可能知道,比如说电脑的“电”这个字全法的学生是否学过。因为教材是多样化的,高考是教育部出的考题,又因为中国文字的特点,我们是无法保证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如果我们出一个400高频字表,这样,无论你是使用张三的教材还是李四的教材,最后这400字都必须得认识。所以,法国就从80年代有汉字门槛。后来当然发展了,一直到2002年,有了你们知道的那几个汉字门槛,所以我说法国的情况还好。在教育部介绍欧洲框架的时候,我去找相关部门,我说我们当然尽可能地接受相关的理念,包括口语方面、一些文化方面、价值观方面,可是有一个前提,汉语要有这几个汉字门槛。当然教育部是尊重我的意见的,这正是让汉语和欧洲框架兼容的第一步。后来EBCL项目也同样遵守了这一点,当然它是更全面的。我一直到现在,都特别注意教育部继续定期地发布汉字门槛作为纲领性文件。因为国民教育要遵守的事实上不一定是框架,而是教学大纲,尽管教学大纲当然是根据框架制定的。

白老师,在您最近的讲座中,我们了解到您关于“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应该被视为第二文字语言教学”的提法,您能跟我们再具体谈谈吗?

我很高兴你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汉语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是我的提法,因为这其实是牵涉到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如果看其他语言,像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第一,这些文字其实是拉丁字母,是分析语音的;第二,因为是分析语音的,而且就几十个字母,那语言和文字之间就有一个或多或少透明的关系。可是中文一点透明度都没有,也就是说,学习者接触一个生字,他无法读音,不像接触一个英语的生词肯定是会读音的。另外,不仅是不可能读音,而且中国文字是由字组成的,而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按我最早在90年代的《世界汉语教学》这个学刊发表的文章,我当时用比较形象的语言是说,中文里边口语和书面语是两口锅。这一说法是比较形象的,意思是说,尤其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两者是相对独立的,这跟字母文字,跟表音文字是两回事。后来我就更明确地提出了所谓的字本位,最近使用“二元论”这一表述。“二元论”正好是第二文字语言这个提法的基础。另外,我早就关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的一句话,同时发现语言学界几乎很少或者没有人评论这句话,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因为不一定符合正统观念。索绪尔的那句话是,“对汉人来说,……文字是第二语言”。我个人非常赞同,尽管索绪尔没有就此多说,可是我理解的是,跟别的语言不同,文字在中文里边所起的作用、所占的地位比较有它的独特性。说文字是第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说明两者有一定的同等性。这是我一贯从教学的角度提出来的,是两口锅。另外,我最早80年代编出的教材里,毫不犹豫地,毫不犹豫地在课本短文下边,不仅列出一个生词表,同时还列出一个生字表。此外,我还在字方面的助记办法上下了不少功夫。而我们西文哪有什么助记办法,哪有对每个字母的频率的思考,当然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因为确实有差异,是本质上、本体上的差异,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提法。汉语对我们来讲就是第二语言,可是为什么不来一个“第二文字”,所以我就比较早地提出来“第二文字”。你们可能会说,有的字母也是第二文字。我同意,比如说一个法国人去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字就是字母文字,可是不是拉丁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门知识,这是要掌握的知识。俄语文字也是第二文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国包括官方部门经常把英文和拉丁字母混为一谈。多少次中国人问我:“白老师,请问您的英文名字是什么?”我当然觉得太好笑了,甚至有一次我在中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输入我

作为导师的信息时感到很惊讶，因为也要求我输入我的英文名字。如果是口头上，我马上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英文名字”，甚至我会提出不懂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其实是将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他们所说的英文名字其实是说用拉丁字母的法文。可是中国人远处一看拉丁字母，就说这是英文。而我们知道这些字母也许是意大利文，也许是德文，也许是法文。所以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说过的，科学的发展是需要经过克服种种成见的。我刚才举的比较好笑的例子，其实是一种成见。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第二文字，当然以汉语为例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中国人学习英语是第二文字，中国人学习日语，部分的也算第二文字，比如说假名。

白老师，您于1989年编写出版了个人第一套汉语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该书被法国高校、中学、民间团体和官方等部门广泛使用，多次再版，总计达18万余册。在中国大陆的汉语教学界，您被认为是“字本位”理论在法国的代表人物，请问当时您编写《汉语语言文字启蒙》这套教材的初衷是什么？您编写这套教材的主要教学理念是什么？

我那本教材是80年代开始自己手写的。其实法国书店有来自中国的教材，包括法文版的，可是我为什么自己手写呢？要注意的是，我那本教材是89年年底90年年初出的，原版是法文版，不是中国市场上的英文版。当时那本书的价格比中国的教材高出两三倍，因为法国的教材出版社是非常讲究纸质，还有图画的。他们还专门去找了一个会绘画的。一开始出版社决定先出1000本，最后改成2000本。他们打算两三年以后再说，因为当时毕竟不知道会不会受欢迎。结果，4个月之内这2000本就卖光了。所以当时很快就发现这个教材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火爆的现象。两年之后中国学界也知道了。这不是我做的努力，根本不是，而是因为在中国《世界汉语教学》这个学刊上，有一位北语的老师叫刘社会，发表了应该是关于该教材的第一篇评论性文章。然后陆续地有一些中国专家也特别关注，也发表了其他相关的文章。

回到你们的问题，80年代我当时主要的岗位是在中学。这又是法国的一个特点，因为我是1978年去参加国民教育部举办的汉语专业师资认证会考的。这个会考是有名额限制的。比如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数学老师、英语老师或者体育老师，你就要参加这个会考。数学会考名额很多，可能每年几百个名额，英语当然也比较多。可汉语很少，有时候是每两年举行一次，每次只有一个名额。可是毕竟是有的，而且这是全球唯一的国家给汉语一个如此正式的地位。我1978年参加这个考试，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要通过考试必须得熟读四部书，其中包括《水浒传》。这些书不是选集，而是要求从头到尾熟悉的。所以要求是很高的，我当时就没抱太大的希望，我也没有好好地复习，没想到我通过了，成为了国家公务员。也就是说，有固定岗位。差不多12年左右，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中等教育的正式的汉语教师。而很幸运地，我的主要岗位是在法国最早创立汉语教学的一所学院，位于巴黎市区的阿尔萨斯学校。而且，汉语是作为第三外语和第二外语进行教授的。你们想象一下，八十年代汉语作为第二外语，也就是说，从初中开始作为必修课，那是极少见的的事儿。这段经历大大地丰富了我的教学经验。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开始自己手写我的教材。君姬的问题是为什么？很清楚，当时我还没有加入国际学术生活，因为我是中学老师，每周18小时的课，还要在大学兼课等。应该说是几乎不可能加入学术生活写文章什么的，可是我的脑子里很清楚，我需要自己写教材，因为中国教材的路子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不是说内容，比如说对话有一些单调或者有一些政治思想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些不碍事，而是教学路子不对头，是不符合汉语的内在逻辑、内在面目的。我觉得我的用词一点也不过分，就是那种处理汉语的方式是歪曲了汉语的内在规律的，歪曲了汉语的特性，抹杀掉了汉语的独特性。

我经常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多音节词，也就是说多语素词，像“国家”这个词，中国教材不给“国”这个基本意思，也不给“家”这个基本意思，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我们这里的角度,从我本人的角度,这是不必争论的,必须得提供每个字的基本意思。不然的话,第一,歪曲了中文,因为中文是表意文字;第二,大大地加重了学习负担,对于记忆算是一种障碍。中国路子的对外汉语教材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把记忆的问题给忽略掉了。我说的记忆,对于我们来讲,每一个字就需要在记忆方面下功夫,必须得提供关于每个字的字形、结构的信息。可是中国教材没有提供,所以我开始手写我的那本教材。下次如果你们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看原件,我保留到现在。你们会注意到,我当时有每课书的生字,除了每个字的基本意思、每个字的原型、每个字的部件,还包括每个字的部件的名称,也就是助记办法。我本来并不想出书。后来,我的一位合作者,北语的张朋朋,他是1988年到法国的。我当时已经写了我的手写教材,他看了以后,初次感受是,根本不像他熟悉的教材,也就是北语的。后来他慢慢地接受了,而且觉得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往这个方向走,然后他鼓励我出书。我当时不愿意,我说我主要是用来教我的学生的,但他说值得出。他鼓励我,他也提出帮我补充校对什么的,所以那本书是1989年年底出来的。所以回答君姬的问题,就是我的初衷绝对是为了恢复汉语应有的本来的面目,另外是满足学习者应该得到满足的需求,比如说,每个字的基本意思、各种助记办法,而且当然是注意到了第二文字的独特性。我也提供了每篇课文的手写体,为什么呢?要认得手写体,中国老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对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困难。所以我就想到了让每课书的短文也有个手写体的对照。因为当时我们使用传真,当时没有电脑,经常使用手写的便条,所以我觉得应该在这方面加强训练。一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读手写体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困难。这是学习者能意识到的。所以我一直说,应该多听旁观者的学习者的意见。

对,我学法语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看到一些手写体的法语信件什么的,尤其是有些人写得特别草的字,字母完全连在一起的那种,我有时候就会辨认半天。

君姬提得很好,她说反过来怕读法文,法文是字母,应该说是没有认字的问题,可是她也比较困难。我作为母语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有问题,比如说法国大夫写的字。是的,这值得做一个实验。比如说君姬和我,我们先看法文手写体,看看我们俩的最后结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再一起看汉语的手写体。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真正掌握的字写的短文来测试,如果写的有一点草,我就会比较困难,可是你们俩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第二语言的识别问题,包括字感问题等等。

是的,白老师,我现在是越来越认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文字语言教学这样的理念了。白老师,下一个问题是,中国语言学家冯胜利教授在2019年在《华文教学与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赵元任的单音节神话与徐通锵的字本位》,他提到“字本位理论是中国学者自己构建自己理论的夙愿”,您怎么看?您一直坚定地坚持字本位,是什么让您如此执着?

首先,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还是要先要弄清楚一点,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语言学的字本位和语言教育中的汉语教育的字本位到底有没有联系?陆俭明教授,他十几年前在《自然科学》杂志(2011年总第52期)上发表的文章就是《我关于“字本位”的基本观点》。他的观点里提到有语言学的层面,也有语言教育那个层面。对他来讲,两者是有界限的。到底两者,徐通锵的字本位和我的所谓的字本位,我更倾向于“二元论”这个提法,到底是否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最后谈的还是“字”这个单位。可是如果你们接受最近几年我的用词习惯,我是“二元论”,可是徐先生呢?他是以字为单位的一元论,在一定程度上他只能接受的是字,可是我是教育的角度,我觉得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既有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学术范围。语言学就是语言学,我一直在这方面提醒学界,因为历史原因,我理解甚至接受最开始我们学科是由来自语言学界的学者成立的,这些学者们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范围内做出

了极大的划时代的贡献。吕必松先生其实从最开始就是教育学家，我觉得他很早就区分了教育的角度和语言学的角度。可是我本人90年代初开始参加国际对外汉语教学的各种国际会议的时候，我明显发现，如果说得直一点，语言学界把我们学术范围给占领了。你们可以拿我们世汉会、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历代的论文集，你们会发现多半的文章就是描述分析语言。语言描述和分析是语言学的宗旨，可是不是汉语二语教育的宗旨，不是外语教育的宗旨。外语教育的宗旨是转化。转化不是分析描述，尽管跟分析描述语言和文字不是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汉语教育作为学科的第一步，是拿原料，就是语言或文字的知识，这些知识当然是语言学界或者文字学界提供的，可是他们只是提供原料，这是我们的起点，而全部的过程跟语言学界无关，也就是说，各种转化的过程没有任何关系。语言学家哪有管课堂的气氛的，哪有去处理比如说评估问题的，哪有去处理语言标准的问题的，哪有讲先教哪些高频字词的呢，哪有讲文化的。语言学它的宗旨里边都不包括这些。我说这些不是指责语言学的不足，不是！语言学的宗旨，就是分析和描述。而我们外语教育如果只是分析描述，不仅是对我们这个学科的一种误解，而且是走向失败，必定走向失败的。所以徐通锵和冯胜利是语言学家，而我作为外语教育学科的，当然有自己的看法。

这里，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在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场的有中国语言学家听我的主题发言，还有一些其他的华人教授。我很快就发现，当然我早就预料到，我的发言中有冯老师和那些我很熟的美国华人教授不能接受的一些观点。我知道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虑的，第二，他们当中可能很少有接触过真正的汉语二语教育的。我呢，法国的幼儿园小朋友我都接触过，当过我的教学对象。小学和中学的当然比较多，我有差不多15年的丰富的中学教学经验，而且这些中学生当中没有华裔孩子，是真正的汉语第二语言和第二文字教学。上面提到的，是我们学科的一个困境，是我们现在处于困境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中国学界因为客观条件从来没接触过外国中学生。而我认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就是中学生。你们只要看看，比如说国际英语教育、国际法语教育、国际西班牙语教育，基本上都是中学是主流，尤其是大语种。如果你们想了解法国的德语教育，我会先让你们去听中学的德语课，大学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边缘的现象。

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有一些误解。我们到底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语言学问题还是讲语言教学的问题？关于语言教学，我认为有普遍的成见，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国家，一个非常流行的成见，当然幸好是越来越少了，是说外语教学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科，说我是特定语言的母语者，所以我可以发表各种观点。其实不是！比如说，我不从事对外法语，但如果说我懂得对外法语，可能就是因为从事对外汉语几十年，而对外法语与对外汉语同属一个学科，所以有很多相通之处。可是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我肯定就不懂对外法语，因为这是一个专业。对外法语在法国不仅是专业，而且我认为是包括所有的外语在内的最先进的专业。所以我们经常是以他们为榜样，无论是从教育理念上，还从课堂教学等各方面。所以有时很难跟有些语言学界的学者进行对话，因为最初有一些误解，也就是说，他们以为我们谈的是汉语，而我们谈的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个学科。吕必松先生作为我们的学科之父，他晚年是明确走向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观点的。吕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是从传统的观点出发最后意识到问题的。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时候，意识到问题是真正的第一步。陆俭明先生我觉得他的伟大之处呢，是他不是对外汉语出身的，他是从事语言学的，是泰斗级人物，可是后来我跟他越来越熟后，我发现陆先生跟很多其他的语言学家不同的是，陆先生是有“教学意识”，翻译成英文是“awareness”。陆先生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强的“pedagogical awareness”，也就是法文里所说的“un sens pédagogique”。说实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多少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除了个别的研究生以外，可是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比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教学经验的教师更有这种“pedagogical awareness”，他能意识到很多教学问题。我上面提到，他第一次发

表的关于对外汉语的一个重大发言,其实他说的那几句话就是所谓字本位的基本内涵,更是二元论的基本内涵。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提出这些是伟大的,因为他不仅是汉语语言学的泰斗,而且是我们外语教学界所强调的“教学感”,即“教学意识”。说实话,很多别的语言学家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我非常敬佩陆先生。

我想再回到之前的问题,就关于单音节语言表述,如果是从正统的、传统的语言学角度,当然可能不一定接受“中文作为单音节语言”这个观点,可是其实我觉得值得进行质疑。也就是说,可能这得更加充分地、更加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个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中文就是不能被看成是所谓的单音节语言”。我的回答是:第一,如果光看口头语言,因为一般语言学的视角(包括中文在内)只看语言这个层面,也就是说以口头语言为主,把文字当成一个辅助的工具而已,而且是为语音服务的辅助工具而已,那么,口头语言他们可能就会说这不是单音节语言,我基本上能接受。请注意,我说的是“基本上”,可是,我不能完全接受。

我现在从学习者的角度,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四、五年前,我跟几位在法国的汉语母语同事开个小会、聊天,有一位同事提到了某某同事的女儿得了厌食症。厌食症,我从来没学过也没接触过这个词,而且那一天是口头上第一次接触这个词。因为我们是随便聊天,所以我没有打断那位同事,没有打断说“哎,什么叫厌食症?”我就简单地用几秒钟,也许是2-3秒钟,我脑子里想一想。因为说是谁的女儿得了厌食症,那我就说看来这是一个病,因为“症”嘛,然后“厌食”,我就很快又用2-3秒钟说这大概“厌”可能“讨厌”的“厌”,“食”应该是“饮食”的“食”,那我就明白了,所以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障碍。“厌食症”这个词对我是完全100%的陌生,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没接触过,可是我当场就明白了。

我现在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为什么?在回答之前,由君姬来作证。君姬,如果我们随便聊天,要么你要么我提到一个,比如说anorexie,这个词是法文“厌食症”的意思,也许在法国人口中有少数人不懂这个词的意思,因为anorexie毕竟是比较专业的词。可是口头上听到anorexie,书面上看到anorexie,肯定听不懂、看不懂,只好查词典。我的问题很简单,我当时听几位同事提到厌食症,这对我来讲这是第二外语。如果是第一语言,如果是母语,有个别的词,我可能也必须得查词典。可是那天我没有查词典也理解了,而且这种例子很多很多,我亲身体会过。只是经过2-3秒钟我就听明白了。我补充一点,如果“厌食症”这三个字是书面语言,我就不需要三秒钟,一秒钟我就能看明白,甚至有时候比较专业的术语对我来讲,对我这个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讲,某一个特定的汉语术语比一语(母语)的相应的词更加透明。我可以给你们举很多真实的例子,我自己经历过的,有的词我看中文就能看得懂,可是法文因为特别专业,我看不懂。

那么,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厌食症”那个词,我当时虽然眼前看不到字,可是还是能听得懂?那所以我的结论,而且对吴老师的问题的最终回答是:简单地排除掉汉语的单音节性质或者否认汉语的单音节色彩,我觉得可能是不太科学的。如果完全否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而这样的例子,我经历过好多次,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语言学传统的视角就是只能承认有口头语言这个层面。可是因为中文的独特性,如果承认中文相对于其他语言是独特的,就是应该注意到分析两个层面:一个是所言说的口头语言,另一个是所书写的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所提供的信息是字,字与字之间会留下空白。我说中文的两个空白之间就是字,而法文和英文的两个空白之间就是词(也许是多音节词)。可是中文的多音节词,只要看书面这个层面,两个空白之间就是字,而且字是语素,这是现成的,像吕叔湘先生说过“现成的就是字”,我现在说包括口头语,有时候也能靠语素凸显语言这个特征,因为中文的第一大特征就是语素凸显语言,语素就是字,字就是音节,所以我比较逻辑地质问:语素就是字,字就是语素,语素和字也是音节,而且中文是语素凸显语言,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文确实或多或少有单音节语言的层面?

您说语素就是字，因为语素和字如果我们细细区分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如果特别细的来说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对话素和字做一定的区分。您怎么看？

对，这当然可以细谈，可以细分。可是毕竟无论怎么样，字、语素、单音节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确实是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大家讲到传统的教学法，都会谈词本位、字本位、语素本位教学法，我感觉有些书上会把教学法大致分成以上三大类。其实我感觉语素教学法可能还是在语言学层面考虑的更多一些，而字本位，尤其是您主张的字本位教学法是在教学论层面考虑的更多一些。我个人是有这么一个印象。

因为我多次在中国做过讲座，最后有的听众会问“您主张的是不是语素啊？”我觉得可以这样回答：早在20世纪5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界最早就在中国成型，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当时提出语素了吗？没有。后来到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几乎很少，甚至没有什么语素教学这些提法。我是说中国国内没有提出什么语素教学，所以我觉得虽然中国学界在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划时代、历史性的，毫无疑问没有中国学界，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作为学科在当时是肯定不能成立的，可是中国学界严重缺乏批评思维，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最早提出语素教学，那本来应该回顾一下，从学科诞生到后来为什么没有提出语素？这就跟汉语水平考试一样，有第一版本，后来第二版本，现在第三版本（HSK3.0）也即将问世，遗憾的是，就在HSK3.0即将问世之际，没有也不会对第二版本进行批评，所以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去向，而且使站在一线的老师含糊不清，处于一个认识方面非常混乱的倾向，这就跟我们做科学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如果有一个新的理论，那绝对必须得说明它跟前一段的理论有哪些差异，这是科学的路径，不然的话，科学是不能健康地发展。所以提到语素的人，没有说为什么之前没有提到语素。

好，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语素的提法，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又反映了中国人有时候缺乏逻辑学的思维，你说是语素涵盖着字呢，还是字涵盖着语素呢，这是逻辑学的问题，逻辑思维的问题。我觉得显然是字涵盖着语素，有某一个字，你才能说这个字跟哪个语素对应，可是你说一个语素跟哪个字对应，你很难说。所以说，字不仅有它的字形、笔画、笔顺、偏旁和部首，而且它也有我们所说的基本意思，这个基本意思跟语素有关。如果你现在跟我说一个什么语素，那么，字是什么？如果字只能当成跟拉丁字母一样的，只是几个笔画而已，那么就产生了我们认为学习汉语的特别明显的障碍。所以语素当然要讲，甚至某一个生字也许是两个语素，尽管可以这样处理，可是我觉得还不如以字为单位，这样很自然就能谈到语素。可是除了语素以外，也可以看到这个字的字形，这个字应该怎么记住？我前面提到了学习汉字跟记忆力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最大的空白之一。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自从最开始，可能还是以“我”为中心，就是以母语者为中心，很少考虑到字是需要记住，大部分的字是合体字，合体字需要记忆策略，需要助记办法，所以我觉得字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单位，字当中涵盖着语素。

基金项目

此访谈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与2022年浙江省来华留学教育科学研究重点委托课题“国际中文教育MOOC与教材：同向同行”的经费支持。

投稿：2022年8月25日；接受：2022年11月21日；出版：2022年12月22日

作者简介

龚君姬，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语言与文化教学法博士。曾先后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巴黎楠泰尔大学任教，拥有十余年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经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国中文教育史、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中外文化对比研究、称谓语研究。

吴剑，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教研组长。201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兴趣为词汇语义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

Make out the True Fac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Mo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ël Bellassen (Part 1)

Junji Gong

Jian Wu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half of th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ël Bellassen. In this part of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Joël Bellassen talked about why and how he himself learned Chinese,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 other languages, the "untranslatability" in translation, the proposal of "dualism" in Chinese teaching, the original purpose to compose the textbook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nd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behind it. His main views are as follows: (1) For Western learners,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Moon", and its "distance" is the greatest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2) The statement "Chinese is difficult to learn" ignores the individu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motivation of the learner; (3) Learning Chinese and philosophy shares similar "meta-curiosity"; (4)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ese teaching, the uniqueness of the language should be prioritized so that learners would "take both words and character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higher level learners reach in learning Chinese, the more word-based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teaching them; (5)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hould be regarded as teaching a second written language; (6) The purpose of linguistics is languag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and the purpos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transformation; (7) In teaching Chinese, one should center on learners and always put in conside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emory; (8)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makes a whole.

Keywords

The motivation of learning Chinese, metacuriosity, dualism, word-based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written language

Junji Go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in th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She obtained her master degre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her Ph.D. degree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from the INALCO University in France. She has taught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over 10 years successively at Sorbonn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and University Paris Nanterre.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in France,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terms of address.

Jian Wu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In 2014, He graduated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 doctor's degree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in the same year, he joined Zhejiang University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 philosoph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exical semantics,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